

旅順博物館

馆藏文物选粹

青铜器卷

文物出版社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

顾问：王星航

总主编：王家胜 郭富纯

副总主编：王 若 葛 华 王智远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芬 王嗣洲 孙传波 房学惠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青铜器卷》

主 编：郭富纯

副主编：王智远 苏广德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芬 王嗣洲 卢桂莲 宋成春 周家花 殷 红

摄 影：连 旭 张邦义

旅顺博物馆

馆藏文物选粹

青铜器卷

旅顺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校对：安倩敏

责任编辑：段书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青铜器卷/旅顺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010-2489-6

I.旅… II.旅… III.①博物馆-历史文物-大连市
②青铜器-简介-中国 IV.K872.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0858号

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青铜器卷

旅顺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 邮政编码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11

200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489-6

定价：218.00元

凡 例

- 一、本卷共选录本馆有代表性的青铜器精品119件套。
- 二、依据器物的用途和出土地，分为食器、酒器、量器、兵器、乐器、杂器六个部分。在编辑时，尽可能将每个部分中的同类器物进行归类，并按照时代顺序排列。
- 三、文字说明除名称、时代、尺寸、来源外，只进行基本描述，并注明相关著录。
- 四、凡经罗振玉所藏的器物，其来源皆注明“罗振玉旧藏”；其他器物，除有明确来源者外，皆注明“旧藏”。
- 五、文字说明中的待识铭文，以“□”代替。
- 六、器物的名称与时代标有英文说明。

序

王星航

旅顺博物馆前身为日本占领大连时期的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始建于1917年，如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以其丰富而别具特色的馆藏文物，享誉海内外。

自1951年中国政府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旅顺博物馆以来，在历届大连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经过旅顺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馆藏文物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已达六万余件，形成四大系列，二十个品类。四大系列主要包括大连地区的考古发掘品，中国历代艺术品，古代新疆文物和特色鲜明的外国文物。

大连地区的考古发掘品反映了大连地区历史发展的概貌。大连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背靠辽东半岛大陆，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海陆交通发达，自古以来便是东北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中国文化向朝鲜、日本传播的枢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连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发掘的初始地之一。20世纪初，日本占领大连之后，殖民统治者在大连及东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开始了文化掠夺，对大连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如营城子汉墓、旅顺南山里等遗址的发掘，曾轰动一时。新中国成立后，旅顺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对大连地区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古龙山遗址证明，早在17000年前，大连地区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居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广泛，著名的长海县小珠山遗址出土的“深腹筒形罐”及其他陶器，说明当时这里的制陶业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郭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蛋壳黑陶与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既反映了这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融合，又体现了大连地区文化的个性

特征。积石墓、石棚墓、石盖墓是商代至战国时代大连地区典型墓葬形制，其中积石墓以大连为起点向北一直延伸到吉林省，这一墓葬文化现象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普兰店出土的汉代马蹄金，则反映了大连地区与汉代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尤其馆藏“北洋保障碑”等清代石刻，更是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的历史见证。大连地区的考古发掘品，系统地反映了大连史前至清代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貌，是研究大连及东北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历代艺术品构成了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基础。主要包括青铜器、陶器、瓷器、书画、木器、货币、印章、石刻、玉器、漆器、甲骨卜辞、文房用具、佛教造像、珐琅器、竹木牙雕工艺品、明清内阁档案、清代至民国年间官员信札等等。这些文物数量众多，品质优良，各成体系，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等项艺术品较为突出。

旅顺博物馆藏青铜器，主要来自我国近代金石大家罗振玉的收藏。1928年罗氏移居旅顺，1940年去世。其部分青铜器曾在20世纪30年代作价转让给旅顺博物馆。另外有数千件散落民间，1951年后由旅顺博物馆收购入藏。罗氏善考据、精鉴赏，其藏品中不乏商周重器。不少藏品铭文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并著录于《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等著作中。如商代的“父癸鼎”、西周时的“过伯簋”、春秋时的“冉钲”等。

陶瓷制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曾经担当过重要角色，除了其实用价值外，还有着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馆藏陶瓷器数量众多，上自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下迄明清两代的各类颜色釉瓷、彩瓷，时间跨度大，基本能够反映出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概貌。

书画是馆藏文物的特色，唐代的佛教壁画、绢画，宋元时代的水墨画，以及明清两代的文人画都有收藏。不少作品曾经国内著名收藏家收藏，部分为清内府旧藏，流传有序，保存完好。有的作品题跋详细，对研究古代画家及画史尤为珍贵。明清两代的作品是馆藏书画的大宗，不仅包括了主要画派和重要画家的代表作品，如当时驰骋画坛的浙派、吴门画派、武林派、嘉兴派、虞山派、常州派、黄山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而且有的作品还是画家存世的孤品和稀品，可以校正和补苴画史。

在馆藏中国历代艺术品中，每一类都不乏艺术珍品，如馆藏古代货币、甲骨卜辞

等，都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

古代新疆文物是馆藏文物中的一大特色。新疆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要冲，是佛教和佛教艺术最先传入我国的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物。旅顺博物馆藏新疆文物，是20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细亚探险队”从新疆劫掠的。这些文物主要掠自吐鲁番、库车、高昌、吐峪沟等地，时代约为西晋至唐朝。内容包括各种佛教壁画、绢画、彩绘陶器、陶塑、丝织品、世俗文书、佛教写印经等，是研究佛教史、中西交通史以及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实物资料。如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的《诸佛要集经》残片，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写本。公元5世纪的梵文《妙法莲华经》残片，是古代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译本的原典。文书中的唐建中五年《孔目司帖》，是目前所见唐代“两税法”在新疆地区实施的唯一完整实物，对研究唐代经济史有着重大的史料价值。此前，中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在新疆地区没有实行过“两税法”。我们相信通过对该文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唐朝中央政府在新疆实施“两税法”的问题，会有一个新的一致认识。

外国文物是馆藏的又一鲜明特色，主要包括古代印度佛教石刻造像，日本、朝鲜古代陶瓷和日本书画，及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代邮票和货币。古代印度佛教石刻造像，是馆藏外国文物的重点。这宗收藏也是20世纪初由日本大谷光瑞“中亚细亚探险队”赴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探险”所得，是目前国内博物馆所藏的惟一宗古代印度佛教石刻造像。其中包括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石刻佛像和波罗王朝时期的比哈尔石刻佛像。犍陀罗佛教造像和波罗王朝的佛教造像艺术都先后传入我国，对我国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馆所藏古代印度佛教石刻造像，对研究古代印度佛教史及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历史极为珍贵。

另外，在馆藏外国文物中，朝鲜、日本的陶瓷器及日本绘画作品，也具有较高的价值。中国与朝鲜、日本比邻，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对日、朝两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两国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将中国文化与其本民族的传统作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馆藏朝鲜瓷器包括三国时代（公元6世纪）至李朝（公元15世纪）等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具有浓郁的朝鲜民族特色。馆藏日本古代陶瓷器系统完整，自日本新石器时代的绳纹陶器，至江户时代的瓷器均有收藏，这些作品做工精良，反映

了各时期日本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馆藏日本绘画作品，主要以日本江户至昭和时期的书画为主，涉及画家200余位，涵盖了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主要画派。如狩野派、圆山四条派、土佐派、花鸟写实派、南画派、浮世绘等等，很多画家为各画派的代表人物。如圆山应举、酒井抱一、古文晁、狩野芳崖、富冈铁斋、横山大观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江户时代以来绘画艺术的成就。

正是因为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及学术机构的关注。为了促进和加强国内外文化交流，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我们拟以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为基础，组织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陆续出版馆藏文物研究系列丛书。同时计划以图录的形式，把馆藏部分文物按专题公布发表，以期为学术界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为我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对这些文化瑰宝，我是观之惊讶、赞叹，却又愧于对灿烂文化缺乏专门研究，好在有旅顺博物馆诸位专家、学者多年呵护与考究，这些馆藏珍品才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我要感谢他们及所有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感谢他们为文物的收集与整理所做的贡献，感谢他们对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奉献。谨以上述赘字为序，也不知是否能够让人们理解出版者的良苦用心，以及对文物事业的忠诚无悔之心，还有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博大与精深。

2006年8月

旅顺博物馆藏青铜器概述

中国古代青铜器品类之多、工艺之精令人叹为观止。而蕴涵丰富思想和无穷魅力的商周青铜礼器不仅成为中华古老文明的一朵绚丽奇葩，更是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旅顺博物馆6万余件藏品中，2000余件青铜器是其中重要的大宗藏品。由于建馆较早以及历史的原因，馆藏青铜器的来源渠道不一，既有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博物馆的旧藏，也有建国后通过考古发掘、民间征集、政府调拨、捐赠等形式收入的藏品。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大多数青铜器曾为近代著名金石大家罗振玉所收藏和著录，这些器物成为馆藏青铜器中的精粹。罗氏于1928至1940年间寓居旅顺。1945年8月苏军进驻旅大，罗家藏品多散失民间。20世纪50年代后，旅顺博物馆在当地以征集、捐赠、调拨等形式陆续自民间收集了数量可观的罗家旧藏，使馆藏青铜器日渐丰富起来，形成了器物种类多、时代跨度大、学术和艺术价值高的藏品特点。总的看来，馆藏青铜器上至商周，下迄元明，其中以商周至汉代的器物居多，种类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既是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变幻莫测的形制和繁缛华美的纹饰而引人瞩目的艺术瑰宝，也是因铭文珍贵，对研究中国古代礼仪、历史和古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珍品。

一、先秦青铜礼器

中国的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步入青铜时代，至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作为生产力发展标志的青铜冶铸业达到了成熟。商代是中国青铜工艺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系初步建立。从考古发现看，在商代前期，爵与觚常常是组合在一起的，这种组合形式的萌芽，为以后青铜礼乐器的发展提供了习俗和观念上的基础。礼器是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崇尚礼制的特殊产物，多用于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飨宾客等活动。在商周时期，不同身份的贵族拥有与其地位相称的礼器，从而使礼器成为划分阶层等级和象征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旅顺博物馆藏商代青铜礼器中，主要有作为酒器的爵、觚、斚、觶、彝、提梁卣和作为食器的鼎、鬲、鬯等。从器物的形制、纹饰以及铭文都可以透视出商代重酒体制的日臻完善和贵族无上而神秘的统治权威，以及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以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线条镌深劲利，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突出了神权和王权的威严。从铜觚由器身较短、侈口宽体式到束腰高体、区段分明的变化可以体察商代前后期器物形制的演变。圭尾铜斗为商代挹酒器，形制特别，做工精致，诠释了商人嗜酒的习俗。而兽面纹爵造型挺秀，纹饰华美，更使人在欣赏之余得以窥见商时贵族重酒之风和“肉林酒池”的奢华景象；鸱鸢首盖壶和象首提梁卣设计精巧，形神兼备，富于情趣，既是实用品，又是优美的青铜艺术雕塑，透视出古代匠人的智慧与灵巧。

从铭文上看，馆藏商代青铜器铸铭较少，多则数字，少则一字。如在祭祀器物内腹或内壁铸“父癸”、“父辛”、“守妇”等字，标明了被祭祀的对象。觚底内缘则多铸有族徽标志。这种单一的徽识应该是代表了器物主人家族的标志符号，是远古氏族图腾的孑遗。而在铭文中多见的“亞”字形，据张光直先生考证，应是明堂的代表符号，体现了殷人尚鬼的宗教观念。

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并出现了向重食体系转变的端倪。随着列鼎制度、编钟制度和赐命作器之习等礼制的完善和发展，西周时代青铜礼器的大量需求促进了青铜器铸造业更加兴旺发达。这一时期不仅器物数量更多，而且由于日渐频繁的祭祀征伐之事，贵族常常将其祭祀、观念上的天命和德治、策命与赏赐、战争与征伐、赏赐土地与土地制度的变革、职官名称、礼仪制度、训诰、计时法等一些思想或大事铭刻铜器上，内容丰

富。一件青铜器铸铭数十字甚至数百字则属常见。这些作品既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汉字字体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旅顺博物馆藏西周青铜器中不乏重器。田告壘因器物口沿内铭铸“田告”二字而命名，此壘直口、广肩、高体，下腹渐收，肩部饰有两个对称的牺首环形耳和六个圆涡纹，腹下部有一个牺首形环鼻。这些装饰与器物精细的质地相得益彰，透出朴素而典雅的气质，具有西周青铜器质朴、粗犷厚重的时代特征。过伯簋铸于西周昭王时期，鼓腹、侈口，圈足下连铸方座。内底刻“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16字铭文，记载了过伯随周昭王南征荆地的史实。而西周青铜器中最具史料价值的当属吕鼎。此鼎为四足方鼎，四角起扉棱，腹上部为垂冠鸟纹，地衬细方云雷纹，余三边饰乳丁纹。器内铸“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饗于大室。吕玚于大室。王赐吕玚三卣，贝卅朋。对扬王休，用作宝彝。其子子孙孙永用”44字。由此得知，此鼎是周穆王重臣吕伯为纪念周王的赏赐而作，为我们了解西周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竞相争霸。“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在青铜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青铜制造业进入了转变时期。旧有的礼制失去了约束力，诸侯各自为政，倾其实力进行青铜制造，以显示国威国力。如果说春秋早期青铜器还延续了西周时期的风格的话，那么到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一改昔日那种神秘奇异的色彩，以其清新活泼的姿态迎来了青铜器发展的又一高峰。新的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多为动物变形。或流转舒畅、或质朴简率。到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战事连绵，社会动荡，青铜器由盛而衰。传统的礼乐器在数量上逐渐减少，日用器开始增多。铜器上的装饰及其制作技法也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出现了髹漆、错金银、鎏金与刻纹等工艺，赋予了原本单调的青铜器以色彩感，使这一时期盛行的几何纹、蟠螭纹，精美绚丽、色彩斑斓。

战国时期的铭文内容较之商周、春秋时代更加简略。如果说先前铭文主要是铸的话，那么这时主要是刻，而且字体结构显得瘦硬。铭文内容一改以前刻功记事的功能，而仅仅记述器物本身铸造的时间、铸者以及容量或重量等。大梁鼎，足呈蹄形，腹壁阴刻“梁廿又七年，大梁司寇赵无智，铸为量，容四分”18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论是祭祀与战争都离不开乐器，所以青铜乐器也是礼器体系的重要内容。云雷纹甬钟和冉钲是春秋时期青铜礼器的代表器物。云雷纹甬钟腔体宽阔，钲、枚、篆、鼓比例适度，造型优美，纹饰简约。而冉钲腔体深长，器壁较厚，且音律准确，器身刻铭文91字，记载了吴王寿梦征伐之事，为馆藏青铜器铸铭最多之器。

作为权仗使用的青铜戚，也应纳入礼器范畴。铜内玉戚，内与援的部分为铜质，其余援体大部分为玉质。这种铜玉相嵌的复合礼器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在商代青铜制品中并不多见，其镶嵌工艺精湛，为研究青铜工艺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上述先秦青铜器多经罗振玉收藏，并为《三代吉金文存》、《梦邨草堂吉金图》、《贞松堂集古遗文》、《商周彝器通考》等金石学著作所著录。

二、量器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很早就知道度量衡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谨权量，审法度，四方之行政焉”，就证明了古代已经非常重视度量衡，并将其看得与法律同等重要。由于当时的度量衡涉及丈田、赋税、交易、水利、城建等重大社会实践，关系到经济的繁荣与政权的稳定，所以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春秋时期的郢权，底凿凹穴，当为校准所用，反映了古人“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的权衡意识。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局面，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为了加强专制集权统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文字和货币。其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直接刻铸在官定的量器或衡器上。传世或出土的秦代量器上带有诏书的为数不少。旅顺博物馆藏有数件秦廿六年诏铜版、椭量、铜权以及标铸“八斤”、“十六斤”等实量的铜权。大多器物刻有秦二十六年诏书。从二十六年诏可知，秦统一六国后仍沿袭孝公时商鞅所制的度量衡标准。字体为秦王朝规定的标准文字——小篆，其整体结构错落有致，整齐划一。特别是瓜棱形五斤权，字体规矩，形制独特，是研究秦代度量

衡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秦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累黍定尺”的实践，建立起完整的计量标准体系。史载：“凡律度量衡者……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说明当时量衡之器多选铜制。汉时圆形铜壶称钟，多为容量器。洛阳武库钟、卫少主钟等器，形制为侈口、束颈，腹有宽平弦纹带，铸一对衔环铺首，并铭刻制造年代、地点、机构及容量等，是了解当时容积、重量及其换算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

元代铜权，多为六面体和圆形权，顶上有穿孔方形钮。由于多数都铸有大德某年和某路造字样，可以明确其绝对年代和制作地点，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元代权衡制度的实物资料，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状况。

量衡器是青铜藏品中重要组成部分，也多为罗氏旧藏之物，并著录于《秦金文录》、《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等著作中。

三、铜镜

自秦汉以后，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功能日渐衰微，但作为中国古代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具—铜镜，却以其精致的制作工艺和丰富多彩的纹饰造型独树一帜，成为馆藏青铜品类中的一大特色。馆藏铜镜有500余面，早自战国时代，晚至明清时期，形制各异，纹饰多样，充分体现了各个时代铜镜铸造艺术风格和人们的审美情趣，成为展示秦汉以降中国青铜工艺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在馆藏诸多铜镜中，最具代表的当属汉镜、唐镜和金镜了。

两汉时期，铜镜铸造无论是工艺水平，还是纹饰都堪称中国铜镜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期。规矩镜、神兽多乳镜体现了人们对阴阳学说和谶纬思想的崇尚。唐代铜镜是因其质地精良、题材新颖及工艺形式的多样化而著称于世的，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铜镜普遍厚重，由于锡、铅成分的增加而更加洁白光亮。外形除圆形和少数方形外，出现了葵花形、菱花形、亚字形、方形委角以及带柄手镜等。镜背

镜形状相配合，既具实用性又具艺术性。唐镜以瑞兽葡萄镜居多，其纹饰以繁密的葡萄为纹样，间缀瑞兽，显得富丽饱满，是盛唐时期最具特色的镜类。葵形千秋龙纹镜本是人们表达节日吉庆之物，主纹为一蟠龙，四足飞扬，造型生动，三朵祥云飘绕其间。外饰云纹，左右铭楷体“千”“秋”二字，堪称集工艺、形制和题材特点于一身的唐镜精品之作。金代铜镜主要有仿镜和自制镜两大类，且镜缘多铭刻监造机构及地点。仿镜包括仿制汉、唐、宋等不同时期的镜子，题材较广，如柳毅传书、犀牛望月等传统故事镜以及象征吉祥的龟鹤镜等。而自制镜则多取材于女真族民间生活，富于生活气息。双鱼镜为其代表，主纹多为双鱼首尾相衔，体态肥腴，神态生动，间衬细密水纹，采用浅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线条粗犷劲猷，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四、少数民族地区青铜器

自商周以来，居住在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在不断吸收中原汉族青铜艺术的同时融合了本民族文化，创造了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至两汉时期达到顶峰。在北方地区，匈奴族长期游牧于草原地区，具有草原民族特点的各式兵器和动物形饰件是其主要青铜制品。不论是连结革带的带扣，还是纯粹装饰用的牌饰，除造型精巧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其上的动物纹饰，图案生动逼真，写实风格浓郁，反映了游牧民族对与其朝夕相处的动物的喜爱和熟知。在制作时工匠们常常把捕捉动物生活的瞬间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加以表现。鹰豹相搏纹带饰，以动物界最凶猛的两类动物间惊心动魄的搏杀为题材，构思奇异，布局巧妙，是北方游牧民族遗存的珍贵艺术品。而多为活动于四川一带的巴人使用的虎纽铎于，丰肩直腹，纽制生动，是馆藏战国时期铜器精品。其形制上大下小，如同钟一样以槌敲击发声。顶上有纽，下部中空。纽为虎形，以绳悬之。虎为巴人的图腾，以虎的形象做纽，表示了巴人的崇拜观念。在西南地区制作的铜鼓造型基本呈圆墩式，鼓身由三部分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鼓起的鼓胴、中间为内凹的鼓腰、下为鼓足。铜鼓可用于乐器、祭祀、战争以及象征财富等。东汉时期六蛙铜鼓属冷水冲型鼓，是一件颇具民族特色的器物。鼓面饰太阳纹，边缘环绕着六只三足蛙，其中三只